

民国学术丛刊·博士论文编

主编 叶隽 副主编 刘训练



中国古代乐器考

萧友梅 著 廖辅叔 译

论中国古典歌剧

王光祈 著 金经言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古代乐器考

萧友梅 著 廖辅叔 译

论中国古典歌剧

王光祈 著 金经言 译

出品人：周殿富
策划：国文创意
策划编辑：刘训练
责任编辑：顾学云 史宁
封面设计：未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乐器考·论中国古典歌剧 / 萧友梅, 王光祈著; 廖辅叔, 金经言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12
(民国学术丛刊)
ISBN 978-7-5463-0951-4

I. ①中… II. ①萧… ②王… ③廖… ④金… III.
①古乐器—研究—中国②歌剧—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875.5②J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2295号

书名：中国古代乐器考·论中国古典歌剧
著者：萧友梅 王光祈
译者：廖辅叔 金经言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刷：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18.75
版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发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号：ISBN 978-7-5463-0951-4
定价：3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民国学术丛刊·博士论文编

主编 叶隽 副主编 刘训练

民国学术丛刊 总序

就中国传统之发展而言,清民之际乃是最重要的转型时代。这里的“民”不仅指狭义上的中华民国(北洋时代与南京时代又不同),也还包括了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帝制崩溃乃是一大转折,由此所开辟者非仅一朝一代之“更名换姓”,更具备我文明中国之步入现代世界的标志性意义。

虽然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进程极其有限,但自清帝逊位、民国肇创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毛泽东曾有意援用中华民国之名号,充分体现出其作为历史过程自觉者的伟人意识,可终究抵不过劝进者“开天辟地”的创新而最后重新更定国号。不过“民”之一字却始终未易,也可见出“清民易代”的长效性。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史意识的逐渐恢复,大陆学界对民国一代学术也给予了高度认同,除了编撰学案、结集成史之外,重印昔贤经典、接续学术传统,则为不可不做的重要举措。除了早期的“民国丛书”(上海书店)以影印本大批量推出各类代表性的民国著作之外,还有诸如“民国学术经典丛书”(东方、中

国社会科学等出版社)、“民国珍本丛刊”(团结出版社)、“六点学术·民国系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至于以民国时代为主要内容的,诸如“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旧籍新刊丛书”(岳麓书社)、“蓬莱阁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各类出版社的“书库”系列也多以民国名著为主,如“商务印书馆文库”、“三联精选”、“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辽宁教育出版社)等;而清点 20 世纪或中国现代学术也多半以民国主打,如“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等;至于以“国学”为题的,亦然,如“国学入门丛书”(中华书局)、“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至于还有所谓“近人学术述林”(浙江人民出版社)、“大家小书”(北京出版社)等可谓不胜枚举,比比皆是。在这种背景下还要推出一套“民国学术丛刊”的意义究竟何在?

总体来说,随着 20 世纪初之废科举、兴学堂的“霹雳手段”,到了 1910 年代民国肇创后的办教育、立学术,基本已是“题中应有之义”,并未掀起绝大波澜。所谓“民国学术”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创立、发展时代的学术状况。虽然这段时间前后不到 40 年(1912—1949 年),但其所产生的丰硕学术成果却不容小觑。就此而言,重刊旧籍,其意决非仅是“旧物利用”;它更指向“重温历史”,意味着我们如何重新认知“昨日”、资鉴“历史”、确立“坐标”、走向“明天”。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充分利用“学术祖辈”的丰厚遗产,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在历史行进过程中不断与“传统”进行对话的自觉意识,这个传统不仅包括中国文明的悠久典籍与先贤智慧,也理应关注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确立典范的“中国现代学统”。而在学术史意识之初的“回归学统”之外,也要有能力在宏观审视世界现代学术发展的背景中从容反省,

我们的学术前辈在传统崩裂、现代初萌、一切仿佛开天辟地的时代里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又留下了怎样的缺憾和距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那代人既要为中国现代学术初期之成就定尺度,也要为中国在世界现代学术谱系中争位置,可谓“重任在肩”。就此而言,出版这套“民国学术丛刊”也还有编选者、导读者、出版者自身的学术寄托。

相比较时贤的“文字飞扬”,这些尘封在故纸堆中的民国旧书自也有其“晦涩艰深”的一面。这不仅是说文字的易代不同、学科的自然演进、关怀的时代语境等等,也还有“今人”与“前辈”的价值取向、文章风格乃至世道人心之间难以避免的缝隙和差距,故此,我们也希望能借助大家的导读,以高深学问而作浅近文字,借助生花妙笔的华彩章句,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我看来,或则可把至今仍在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历程,分为三段六代人。就时段来看,可以分为三段:1912—1952年;1952—1992年;1992—2030年前后。本丛书涉猎范围,基本上是第一阶段和前三代人。第一阶段可谓“黄金时代”,虽政治变动频繁、战争此起彼伏,但学人仍作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第二阶段基本属于荒废和接续时代,19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史自觉意识的确立才真正接续了原有的现代学术传统;就第三个阶段来说,中国现代学术才刚刚开始不久,仍在进程之中。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是否能拿出“过硬”的成绩来,对于“中国崛起”至关重要。因为,一方面是条件基本具备。当此时代,学术史意识已成常识;全球化趋势已大势所趋;电子信息化的应用也都相当普及。中国现代学人可以基本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对西方学者,挑战和机遇并存。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做?另一方面,国

家之发展需要学术的进步、思想的创生。撒切尔夫人不无傲慢地宣称,中国崛起不足为虑,因为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只输出物质产品而没有精神产品;在她眼里,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文化产品可言。未来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期。而最关键的,则是中国的大脑,作为学人的学术与思想,因为他们将成为中国前进的灯塔。故此,学人之承担国运之责任也不可谓不重。当然,这里重点关注的仍是民国,将其定义为狭窄的概念之内,即传统上的 1912—1949 年间。虽然就长时段眼光观之,这短短的 37 年间实在不过“白驹过隙”,可其中孕育的学术生机可能,却确实是“浩浩然大哉”。

就代际变迁来看,可分六代人。原生代(即介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过渡一代人),以沈曾植、罗振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在 1870 年前后出生,在传统学术方面造诣深厚,部分学人又借助留东(日本)之便,而得以窥见西学门径,乃是传统学术的终结者与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一代人;第一代人,1890 年前后生人,以陈寅恪、胡适、汤用彤、吴宓、郭沫若、冯友兰、朱光潜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具有良好的国学修养,并得时代之机遇而能留学西方(主要是欧美,但如陈垣、钱穆等未留学),不以求学位为终极目标,在五四前后留学归来,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颇多人集中在北大、清华这两大重镇;第二代人,1910 年前后生人,以钱锺书、费孝通、冯至、季羨林等为代表,他们仍具有一定的旧学基础,但除极少数外已难与前代人比肩,多半在抗战前后留学归来,获有博士学问,倾向专门之学,以外国做研究对象者不少,他们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 1980 年代后的学术薪火传承有重要意义;第三代人,1930 年前后生

人,以李泽厚、庞朴、叶秀山、谢冕、刘再复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在一种救亡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中成长,多半没有留学机会,学术训练与知识积淀都有先天不足,但具备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自学成材的能力,部分学者能利用特殊的时代境遇仍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第四代人,1950年前后生人,以葛兆光、陈来、陈平原、桑兵、汪晖等为代表,他们多半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或研究生,有机会到国外进行学术研究,接触到西方的学界状况,部分人也攻读了学位,并借助改革开放和中国发展的东风,形成了自觉的学术史意识,重新接续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较之前代学人明显有突破,积累了相当的学术成绩,是目前学界的领军人物;第五代人,1970年前后生人,这代人基本尚在形成之中,他们是第四代学人的弟子辈,同时又与第三代学人产生某种“亲密接触”。当然,这样一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它的特征概括也只是相对而言,其目的是为理解民国学术提供一种参照系和整体学术地图坐标。

民国一代学术,主要是第一、二代学人的学术空间。当五四一代以一种“元气淋漓”的激烈方式而确立起自己在学术、文化场域的主导性占位后,后五四一代当然深受影响,纷纷漂洋过海,学习师辈的成功经验,立志“为中国文化寻路”;在1930年代后期,他们的弟子辈多半放洋归来,成为抗战建国年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生力军。尤其是西南联大的熏陶下,可谓成就了“两代学人”的精彩共舞时代,中国现代学术不但开创了极为辉煌的“事功年代”,且不说自然科学家如华罗庚、陈省身、周培源、吴大猷、曾昭伦等人的成就,就列举一下人文学者的著作吧!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金岳霖的《知识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锺书的《谈艺录》、潘光旦的《优生

与抗战》……正所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纪念碑文)。

当前辈学人的学术史勋绩以如此绚丽、厚重甚至不乏悲壮的方式集中呈现时,他们坚守“书斋”的努力和“纸上苍生”的努力,就不仅是一种资源,一种能被后世学人再生利用的宝贵学术资源,而且也自然形成一种坐标,一种后代学人可以由此出发、寻得自己精神安身立命处的“大学术”!这样一种坐标,或许还不能给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苦苦支撑的纯正学人以实在的“物质支援”,但朱自清先生拒绝美国救济的选择,却仍有那样一种无言的力量。这样一种坐标,其实传递给我们的,更是一种传统,一种中国学术积淀千载、现代重生,完成转型之后又规定未来民族血脉的纯正学统。这,才是最值得发覆的一层含义。

相比较原生代人的元气淋漓、第三代人的先天不足、第五代人的行进之中,那么,目前最能代表中国现代学术创造实绩的,是第一、二、四代人的学术成绩。尤其是作为承上启下、接续学统的第四代人,他们可谓是“后来居上”,已经贡献出了相当不凡的学术成绩,而且在著述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不凡的表现。诸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2卷、汪晖《现代中国思想之兴起》4卷、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桑兵《国学与汉学》等皆堪代表,相信不但可以“藏之名山”,亦确可“传之后世”。但恐怕不得不承认的也是,在第四代学人中确实尚未出现如陈寅恪、钱锺书那样横贯而通的大家人物。

民国一代学术,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纯正源头,其功用也不可谓不大。希望我们这些来此探胜者,不要采玉宝山,空手而还。重温第一、二代学者的学术史贡献,不但可以使我们借鉴学

习前人呕心沥血的资源宝藏,而且更可以重温激情岁月的开创时代的学人精神。通过民国学术的重要成就的梳理和重版,我们希望能再现那代学人的“岁月峥嵘”。无论是在文史哲等人文领域的“确立典范”,还是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凡起例”,我们看看著作的题名和作者的立意,就知道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前贤曾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曾确立了一个如何辉煌的起点?本丛书虽然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但却并非不具备学科史的基本眼光,邀请的导读专家就是从这样一个层面考虑。而在一般意义的学科划分系列之外,又特别增辟了“海外博士论文”系列与“学术研究译著”系列。前者希望借助民国学人在留学时代的精彩创发,让我们一窥兼采中西之后的学术规训之作究竟可以达到怎样的一种层次,虽然其撰作语言并非中文,可这毕竟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借助学术父辈们资鉴他山之玉的具体成果,希望不仅能将他们呕心沥血而移玉东来的学术译著化为今日后辈负重前行的重要资源,更期待藉由此一窗口展现那代学人胸怀天下的“世界学术”之整体认知。敬请读者关注。

陈寅恪先生曾批评当时的中国学界谓:“国人治学,罕具通识”(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他这是以世界学术的眼光来衡量正在创立期的中国现代学术,其批评不可谓不严厉,其言辞则不可谓不中肯。吾辈或可加一句,“有之,自寅恪先生始”。作为中国现代学者第一人,寅恪先生强调“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他不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确立起关乎中国现代学术根本的价值观,为后世学人之立精神;更以治学态度的“通识观”确立起学人微观层

面可以依循的伦理观。而中国现代学术的未来发展若能建立在这样一种“通识意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基础之上,则中国现代学术之于世界学术的位置,或可有所希望哉!是为序。

叶隽

2009年4月16日—6月15日

作于北京—欧行旅次之柏林,改定于7月26日北京

萧友梅 德文原著

廖辅叔 译

中国古代乐器考

(前 3000—1700)

导读

一

萧友梅(1884—1940),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者、专业音乐创作的先行者和音乐理论的探索者。

萧友梅字思鹤,又字雪朋,广东香山人。幼年时随全家移居澳门,曾与孙中山先生为邻,受革命思想熏陶,又受邻近的葡萄牙传教士奏乐的影响,而对音乐产生了兴趣。1900年,中学入广州时敏学堂,攻读新学课程。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并在东京帝国学校选习钢琴、声乐。1906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教育学,继续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在这期间,他经孙中山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常掩护中山先生和廖仲恺等在日本的革命活动。1909年,萧友梅毕业回国,先后被任命为清政府奏派学部视学官、民国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广东省教育司学校科科长。

1912年,萧友梅在孙中山的安排下赴德国留学。他在莱比锡大学攻读教育学,并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理论作曲。1916年,他以《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一文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萧友梅的留学经历始终与教育及音乐相关。1920年3月,36岁的萧友梅回到北京,由此将他的人生与中国近代音乐及音乐教育的起步紧密联结在一起。5月,他发表文章,希望国内设音乐教育机关,认为发展音乐的关键在于音乐教育。9月,他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大哲学系讲师及音乐研究会导师,主讲和声学等课程,好奇赶来听课的学生达千余人。两年后,他向蔡元培建议并得到支持,将北大音乐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设“本科”与“选科”,开始招收学生,“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改进中国国乐”,并自任指挥、组织管弦乐队进行公开演出,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正式的管弦乐队。在此期间的1921年,他被聘任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专修科主任,讲授乐理、音乐史等课程,其后,此系被划归为国立女子大学,萧友梅始终担任音乐科、系主任之职。1926年8月,他又兼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音乐系主任。

1927年6月,北洋军阀(奉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刘哲,以“有伤风化”下令撤销北京国立学校所有的音乐科系,萧友梅南下上海,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于11月27日筹组成立我国第一所独立正规的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院。音乐院建立之初,由蔡元培兼任院长,萧友梅为教务主任主持一切实际工作。1928年,萧友梅被正式聘为院长,1929年国立音乐院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仍任校长,直至1940年12月去世。

从创办国立音乐院直至萧友梅去世的 13 年间,正值中国国事艰难之时。时局动荡致使国立音乐院(包括国立音专)在 13 年间历经 9 次搬迁^①,经费拮据更是萧友梅难以解决的重压。他鞠躬尽瘁,为这所风雨飘摇中的音乐学府贡献了毕生心血。萧友梅办学以“教授音乐理论及技术,养成音乐专门人才及中小学音乐师资为宗旨”,形成了完备的专业设置;他视高水平教师为办学关键、求贤若渴,并聚集了从欧美归国的许多中国音乐家和国学、词学名家以及来华的西方知名音乐家、外籍演奏家,形成了高水平的师资力量;他广泛开展音乐演出活动和音乐社会活动,扩大学院的社会影响;他创办音乐刊物和音乐社团,推动音乐理论研究的发 展。因此,在中国近代自己培养的第一代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中,相当一部分都来自这所 学府。音乐院的创建结束了中国无独立高等音乐学府的历史,对 20 世纪华人音乐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

萧友梅创作了为数不少的音乐作品,包括各类歌曲约一百余首、大合唱两部、钢琴曲三首、大提琴曲一首、弦乐四重奏一部、乐队作品两部。^②

他的歌曲创作多与易韦斋(词人)合作,编成《今乐初集》(1920)、《新歌初集》(1923)和《新学制唱歌教科书》(1924),这些

^① 刘再生:《音乐界的一桩历史公案——萧友梅和冼星海、聂耳的“是非恩怨”》,《音乐艺术》,2007(3)。

^② 梁茂春:《拓荒者的足迹——为纪念萧友梅逝世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而作》,《乐府新声》,1991(2)。

歌曲大多为满足教学之需而创作。其中歌曲《问》发表于1922年,在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广泛流传,这首歌委婉地唱出了青年人对祖国山河沉沦的忧虑,蕴含无限感慨。《卿云歌》作于1920年5月,歌词是章太炎建议的《尚书大传》中的古诗,经他谱曲后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国会定为国歌。在萧友梅之前,我国的近代歌曲创作基本处于“选曲填词”阶段,绝大部分学堂乐歌采用外国曲调填写歌词,萧友梅的歌曲创作技法即使还不太成熟,也依然具有开创性意义。

萧友梅的音乐创作有多个“第一”:《哀悼进行曲》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首西式管弦乐曲(由同名钢琴曲改编),于1916年为悼念辛亥革命将领黄兴、蔡锷而作。这一年,他还创作了中国第一首弦乐四重奏《小夜曲》,第一首中国大提琴曲《冬夜梦无词》,第一首军乐合奏曲《在暴风雪中前进》。^①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舞》作于1923年,他指挥北京大学管弦乐队首演,这首作品力图表现中国民族特色,在当时颇受好评。萧友梅的器乐创作有着模仿西方同类作品的痕迹,但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创作起步初期的代表性作品,具有启蒙意义。

为满足教学需要,萧友梅编著了各种类型的教材,包括《普通乐理》(1920)、《和声学纲要》(1920)、《近世西洋音乐史纲》(1921)、《新学制乐理教科书》(1924)、《新学制风琴教科书》(1924)、《新学制钢琴教科书》(1926)、《小提琴教科书》(1927)、《普通乐学》(1928)等^②。《和声学纲要》为中国音乐史上第一本

① 梁茂春:《中国的第一首管弦乐——萧友梅的〈哀悼进行曲〉及其他》,《音乐研究》,2008(3)。

② 根据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编《萧友梅音乐文集》附录《萧友梅生平年表》整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